

汤志钧◎著

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

汤志钧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汤志钧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ISBN 978-7-5520-1883-7

I. ①历… II. ①汤… III. ①史学-研究 ②史料-整理-研究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3641 号

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

著 者:汤志钧

责任编辑:王 勤

封面设计:吴佳乐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刷: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9.75

插 页:4

字 数:184 千字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83-7/K·380

定价: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汤志钧，江苏常州人，1924年生。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史地系。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近代史研究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教授，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经学史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史硕士生导师。曾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史学”学科规划组成员，为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1994年退休后，仍任《辞海》编委、分科主编，《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致力于中国经学史、中国近代史及戊戌变法史研究数十年，具有极高的造诣。曾多次赴美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港、澳地区讲学和访问。2008年9月，获“上海社会科学院杰出贡献奖”；2014年8月，获“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2005 年 10 月,作者与夫人郁慕云在天津梁启超故居前



2012 年 10 月,作者与长子汤仁泽出席清华大学召开的“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研讨会



2015 年 1 月 3 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梁启超全集”开题报告会,汤志钧是该项目的首席专家



2015 年 12 月 29 日,作者出席复旦大学举办的“艾尔曼教授荣退学术研讨会”



2016年8月18日,作者(前排右六)出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



作者在新著首发式上

序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整理,史料整理有助于历史研究,两者互为依存。

我潜研历史已经几十年了,整理史料,写成文章,也超过半个多世纪了。回首往事,倍增感慨!

1956年,国务院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通过国务院招聘委员会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1958年,改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直到70岁退休。退休至今,也有20年了,年逾90,垂垂老矣。

有人说我写书出书是名利思想,我不能说没有名利思想,但年高体衰,还图何名?还想何利?只是积习难改,不吐不快耳!

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互有依存,质之方家,以为然否?

2014年8月30日

目 录

序 1

学术讨论

革命和光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3
一场争论	6
“张园国会”	8
翁同龢与“新政”“变法”	10
潘景郑谈章太炎	13
庄存与“会墨”	18

著述介绍

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谈“文化大革命”前历史研究所的四部史料书	23
关于国家课题成果《西汉经学与政治》	25
关于《近代经学与政治》	27
关于《章太炎年谱长编》	30
关于《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	32

序跋题记

《经与史·康有为与章太炎》序	41
《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庄存与和经今文》前言	43
《改良与革命的中国情怀——康有为与章太炎》引言	44
《梁启超全集》前言	45
附录一 《梁启超全集》的编辑和出版	52
附录二 纪念梁启超诞辰 130 周年——《梁启超全集》编纂工作启动	55
朱自奋	55
《上海中医药文化》序	57
《书札辑存》序	58
《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序	59
《梁启超年谱长编》日文译注	60
《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重版题记	63
《吴乾兑论文集》序	64

《近代上海大事记》前言	65
关于《湘学报大全集》	69
祝《翁同龢研究》创刊	71
《知新报》重印合订本发行	72
《南长街 54 号梁氏档案》序	73
重见“光明”	74

读 书 札 记

读《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77
读《量守遗文合钞》——黄侃与章太炎、刘师培	81
读《大师传道》有感	89
行文宜慎	92
持之以恒与言之有故	94
章太炎《与胡适书》	96

怀 念 往 昔

纪念江庸先生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99
怀念全增嘏	100
忆李亚农	102
怀念李文海	104
悼祁龙威	105
《礼》学专家任铭善	106
怀念郁慕云	109

学 术 活 动

出访讲学	113
港、澳、台学术交流	118
我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23
在历史研究所讲历史研究所的历史	127

附 录 一

风云变幻的晚清 70 年(1840—1911)	131
-------------------------------	-----

附 录 二

学人简介——汤志钧	杨志远	141
汤志钧教授访问记	访问: 蒋秋华 整理: 许政雄	145
他是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	田波澜	148

学 术 讨 论

革命和光复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辛亥革命,各省光复。革命、光复,却非同一含义。

“革命”,早在《周易》即有记载,《周易》有“革卦(䷰)”,离下兑上。说是“革命三就,有孚”。意思是改革的话,讲到多次成就,才有信任。改革只有取得成功,才能使人相信。所以改革是不容易的,也不是一次改革,就能完全见效的。《周易·杂卦》又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意思是:破坏旧的,建立新的,“革故鼎新”。也就是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除旧才能创新。革是变革,命是天命。我国古代的汤、武“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孟子·滕文公下》:“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就是因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照此说来,“革命”,古有其辞,“革”是“去故”;“革命三就”,不是一革即就。

光复,却不是如此。

光复,犹言恢复,收复。《晋书·桓温传》:“廓清中畿,光复旧京”。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汉族是主体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与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少数民族有时也入主中国,如元和清,就是由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国的。“反清”革命,也称之为“光复”,意味着“收复旧邦”。清末还有以“光复”为名的政治团体和军事组织。

那么,“革命”、“光复”,不是同一含义。“革命”不是一革而就,“光复”则是“光复旧物”。

※ ※ ※

光复会的定名,或与章太炎有关,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光复、革命的异同。

早在1903年,章太炎在《序〈革命军〉》中说:

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①

“苏报案”发生,章太炎入狱,在其《狱中答〈新闻报〉》中他说:

吾之序《革命军》,以为革命、光复,名实大异。从俗言之,则曰革命;从吾

^① 章太炎:《革命军序》,见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第193页。

辈之主观言之，则曰光复。^①

他是将革命、光复视为“名实大异”的。1902年，当他设想撰写《中国通史》时，在其所拟目录中，“十二志”首列“种族志”，“十记”首为“革命记”^②，末为“光复记”，认为“田不均……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③，并提出看法。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还说：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则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
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④

革命不是一事一物，一革而就，而是不断革命的。

章太炎还在《革命军约法问题》中说：

盖吾党之革命者，与他国异。他国革命，政治之以主；吾党之革命者，先为
种族，次为政治。自他国革命家观之，则以革命覆此政府，非曰从本以来不认
为己国政府也。自吾国革命家观之，则本不认为己国政府，革命者，所以不彰
不认之心，非曰未有革命军时彼政府即吾政府也。^⑤

认为中国革命与其他国家不同，它不是革命一次即能成功，当今之计，首先还是要推翻清朝，“光复旧物”。所谓“民族革命，光复旧物之义。自船山、晚村以来，彰彰在人耳目，凡会党户知之，凡妇女儿童亦户知之”^⑥。船山，王夫之；晚村，吕留良。再次说明，革命不是一次即能完成，目前首要还是光复。

* * *

辛亥革命胜利，武昌起义成功，接着各地先后光复，当时报刊纷纷登载光复情况，还有以“光复”命名的书籍出版。11月3日，上海光复；次日，出版了《光复报》，载有《上海光复记》，逐日报道光复情况。《中华民国光复上海记》也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由光汉学社出版。其他《上海商团光复上海记略》等书也陆续出版。中小城市的光复也纷纷登入报章，如《青浦光复记》，载《申报》1911年11月9日、12日、15日，《川沙、奉贤、南汇光复》，载《民立报》1911年11月8日。真是一片光复声，共庆反清成。其实，各省的光复，并不全是光复会的劳绩。光复会也只是在上海光复、浙江光复以及会攻南京，进行北伐中起过作用。光复会的《誓言》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前两句是光复的目的，后两句却表明“功成身退”。没有考虑怎样继续革命，怎样建立民国。不久，陶成章被刺，功未成而身已

①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3页。

②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1912年7月，同上第168页。

③ 章太炎：《定版籍》同上第188—189页。

④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年5月，同上第204页。

⑤ 章太炎：《革命军约法问题》，1908年7月10日，同上第430—431页。

⑥ 章太炎：《再复吴敬恒书》，1908年7月10日，同上，第436页。

死。其他领导又和同盟会摩擦,没有“功成身退”,却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走入歧途。指挥上海光复的李燮和参加了“筹安会”,成为洪宪六君子之一,拥护袁世凯称帝。浙江光复担任都督的朱瑞,瞻前顾后,最终投入袁世凯怀抱,被封为“兴武将军”,这样的“誓言”,不切合实际。李燮和、朱瑞不是继续革命,而是走到了反面。

至于章太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后再是“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但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土地,与马相伯等发表宣言,以鼓励其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之勇气,^①忧国忧民,高声疾呼。即使“退居为宁静的学者”,还是宣言抗日。

革命不是一革即成,孙中山遗嘱:“现在革命尚未成功”,这时距离辛亥革命已经14年了。

辛亥革命,各省光复,但革命却未成功,它和光复不同。

^① 《三老宣言》,《申报》1933年4月2日《本埠新闻》。

一场争论

学术讨论有不同意见发生争论,那是很正常的。对待不同意见,我一般听之任之,很少反驳。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对所见文章和我所著有争论的,也听之任之。但 55 年前,却有过与李泽厚的争论,而且还是由我而发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5 年第二期的《文史哲》上,李泽厚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一文,其中颇有史实错误、前后矛盾之处,如:

这种以公羊三世封建学说为形式的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就正是康有为整个思想的根本骨干和其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

那么,康有为早就信奉“公羊三世说”了?文章又说:

《大同书》虽然成书极晚,虽然其中还夹杂着某些康有为晚年的思想,但是其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却是产生得颇早的。康有为本人及其亲密的学生、朋友(如陈千秋、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原注)曾不止一次地说明过这点。实际上,1884 年演大同之义的《人类公理》就是《大同书》的初稿。康氏虽然“秘其稿不肯以示人”,但却在讲学和交游中向其最亲密的学生、朋友宣传了他的这种乌托邦思想。

这里一会儿说“《大同书》虽然成书极晚”,一会儿又说“1884 年演大同之义的《人类公理》就是《大同书》的初稿”。不但词意矛盾,而且把《大同书》和《人类公理》混在一起,那就更是凭空臆测了。

我认为《大同书》是康有为在 1901 年至 1902 年所撰,与《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孟子微》《论语注》撰期相近,梁启超手写《延香老屋诗集》在《大同书成题词》下加注云:

启超谨案:先生演《礼运》大同之义,始终其条理,折衷群圣,立为教说,以拯浊世。二十年前,略授说于门弟子,辛丑、壬寅间避地印度,乃著为成书。启超屡乞付印,先生以为方今国竞之世,未许也。

说“辛丑、壬寅间避地印度,乃著为成书”,是可信的,梁启超手写康氏《延香老屋诗集》,康有为当然看到。

至于说“《人类公理》就是《大同书》的初稿”,那就更不对了。我当时没有看到《人类公理》,相信李泽厚也没有看到^①,它也不是“《大同书》的初稿”^②。

① 多年后,我才看到原藏康同壁先生处 1947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所制显微胶卷中的《实理公法全书》和《康子内外篇》,《康子内外篇》共 15 篇,前 9 篇曾在《清议报》发表。

② 《大同书》手稿分藏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

这样,我接连写了《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两文,分别发表在《历史研究》1959年8月号 and 同年11月号,摆事实,讲道理。例如,《大同书》中讲述印度事迹甚多,从而信从梁启超写于“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时所撰;又如康有为于1900年2月1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二日)至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国保护。8月,英国新加坡代理总督J.A.斯韦登汉(J.A.Swettenham)邀往槟榔屿,在总督署中。1901年9月,英政府正式任命J.A.斯韦登汉的兄弟F.A.斯韦登汉为新加坡总督。《大同书》中所谓“吾所识星加坡两巡抚皆不娶妻”,即指新加坡总督斯韦登汉兄弟^①,对《大同书》的写作年代提供了证明。

《历史研究》两篇文章发表后,再没有听到李泽厚的答辩,但我和他的争论,在国内外却起了一定反应,日本小野信尔教授还撰文在《东洋史研究》上发表。

事隔多年,在一次国际讨论会上,我与李泽厚都参加了,彼此并没有交流,但在休息时,双方恰坐在相邻的沙发上,日本京都大学的狭间直树找住机会,给我们两人照了相送给了我。今天展视,也很有趣。

^① 见 Walter Makepeace: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第一卷第124—129页,1921年伦敦出版。